

中国出版

● 主编 宋原放 ● 副主编 吴道弘 张立升 王建辉

ZHONGGUO CHUBAN SHILIAO

现代部分

史料

● 补卷 上册
陈江 辑注

山东教育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6228.05
13
4
中国出版史料

主 编 宋原放

副主编 吴道弘 张立升 王建辉

现代部分

● 补卷 上册 ●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三七年七月)

● 陈江 辑注

山东教育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补卷）

宋原放 主编

（上 中 下）

陈 江 辑注

出 版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250001）

电 话：（0531）82092663 传真：（0531）82092661

网 址：<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

规 格：850mm × 1168mm 32开本

印 张：35.75印张

插 页：7插页

字 数：785千字

书 号：ISBN 7-5328-5242-3

定 价：75.00元（上中下）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0539—2925659）

编辑说明

一、《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主编宋原放，副主编吴道弘、张立升、王建辉）共三卷五册，已于2001年4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所包括的时间第一卷（上、下册）为1919年“五四”运动至1937年7月（陈江辑注）；第二卷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9月（吴道弘辑注）；第三卷（上、下册）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9年12月（方厚枢辑注）。

二、《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补卷》的内容是在现代部分三卷出版后继续收集到的出版史料，共分上、中、下三册，各册所包括的时间，与正编三卷的时间大致相同（下册史料下限截至2005年12月），分别由陈江、吴道弘、方厚枢按照各自原先担负的部分辑注。

三、《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补卷》的编辑体例，与正编的内容保持一致。

四、本书补卷的编辑出版，是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领导同志的关注和中国版协老出版工作者工作委员会的指导，并得到山东省版协领导同志和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得以出版，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2005年12月

编者附记

十分遗憾的是，主编宋原放先生在 2005 年 6 月 30 日在上海不幸病逝。补卷出版时，他已不能看到了。缅怀他对编辑出版史料的贡献，执着认真的工作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为做好出版史料后续工作而不懈努力。

目 录

上 册

编辑说明	(1)
新潮社的始末	李小峰 (1)
一个最平凡的人	章锡琛 (49)
章锡琛先生传略	章士敦 (58)
一个平凡、笃实而又伟大的人——纪念夏丏尊先生	
百岁诞辰、40 周年忌辰	王知伊 (65)
我的回忆 (第一、二节：走向革命、入党前后)	
.....	胡愈之 (72)
中国新文化出版事业的开拓者胡愈之	张明养 (103)
人民出版社事业的先驱者——胡愈之	王仿子 (111)
我在商务印书馆的四十年	黄警顽 (121)
三十年代上海生活书店的批发工作	邵公文 (130)
三十年代生活书店的推广宣传工作	赵晓恩 (135)
两年来之出版界	舒新城 (144)
申报馆：报业之外的图书出版	王建辉 (151)
《新译世界统计年鉴》序	卢 靖 (160)
第一回《中国年鉴》序言	阮 湘 (163)

有关《东方杂志》的史料	(165)
一、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	(165)
二、本刊的新生	愈 之 (166)
三、重印《东方杂志》全部旧刊五十卷序	王云五 (168)
四、《东方杂志》——近现代史的资料库	陈 江 (170)
《国民杂志》序	蔡元培 (176)
《新社会》发刊词	郑振铎 (179)
《中学生》发刊词	夏丏尊 (181)
《生活》周刊的编辑艺术	俞月亭 (183)
《世界知识》与生活书店	徐伯昕 (199)
《汗血》与“文化围剿”——文化“围剿”口号	
探源	王锡荣 (205)
《红》发刊词	严独鹤 (213)
编余琐话	茗 狂 (215)
花前小语（《红玫瑰》编者话）	赵茗狂 (217)
鸳鸯蝴蝶派文艺期刊目录简编	(219)
上海的定期刊物	胡道静 (232)
1843~1949年上海出版机构一览表	(275)

新潮社的始末

李小峰^①

[上] 新潮社的前期

一、《新潮》——从酝酿到出版

新潮社是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学生在进步教授的思想影响下，集合同好，为了出版《新潮》月刊，与《新青年》杂志相呼应，成立的一个团体。

当一九一六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积极刷新校务，添设科系，延揽专家担任教席，提倡学术研究自由，不分派别，兼容并蓄，对于新文化运动支持尤力。并聘请《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一时人才云集，新旧学者，青老师生，聚集一堂，钻研学问，学术空气空前浓厚，不愧当时有人尊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学府。为《新青年》写稿的人士，如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等，都集中在北大执教，他们在《新青年》月刊中，高举民主、科学和文学革命的旗帜，与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展开了战斗。在这种新思想的影响和激荡下，北大一部分觉悟的青年学生便起而响应，组织团体，创办刊物，并得到进步教授的支持、协助和指导，《新潮》月刊便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同读者见面了。

但《新潮》不是一下子就能出版的，在出版之前经过一段相当长的酝酿时期。还是在一九一七年的秋天，新潮社的发起人，傅斯年^②和顾颉刚^③住在同一宿舍的同一间屋子里，方由北洋大学移来北大文科上学的徐彦之是他们的近邻，经常在一起闲谈。他们谈到北京大学的前途时，感觉到自蔡校长主持北大后，学校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学府，循此前进，不难成为中国一切新思想、新学术的策源地。做学生的应该办几种杂志，竭思尽力，来宣扬学校的新精神，鼓动学者研究学术的兴趣，这对于自己的前途也有好处，又可以作为将来走上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工作岗位上的一种练习。后来因顾颉刚、傅斯年的关系，有一些同学，如罗家伦^④、潘家洵等，也经常加入他们的闲谈。但办杂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存在着种种困难和问题。

到了一九一八年的秋天，在一次闲谈中，徐彦之提出：“空谈无补于事，何妨尝试一回，办不成功也没有关系。”于是就开始计划起来，当时最难解决的是经济的来源。老实说，这时原发起的几个人差不多都是苦读书的穷学生，家庭负担学膳等费已很吃力，再要为办杂志向家庭伸手，是有困难的；即使束紧裤带，节省出一些钱来，拼拼凑凑，也凑不出许多；稿件依靠大家勤动动笔，倒还不成啥问题。继而急中生智，就想到学校头上，有人说：“大家都是北大的学生，办杂志主要也是为学校着想，不妨同学校当局商量商量，或者可以帮助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但向谁商量呢？又有人想到：“大家都是文科的学生，所要办的刊物，又是偏重文艺的，先同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比较相宜，何况陈独秀正在提倡新文化，不致于碰钉子”。于是推了徐彦之去见陈独秀，提出要求，反应很快，不久就得到了答复：“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⑤这个满意的答复，给大家极大的兴奋和鼓舞。

经济问题解决了，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等就开始研究社的组织和出版刊物的办法。在这个时期内，又有俞平伯、杨振声、吴康、毛准、张崧年、汪敬熙、谭鸣谦、高元等同学陆续参加。他们对于办刊物都是颇有兴趣的。十月十三日开了第一次预备会，讨论刊物的性质，就是究竟办什么性质的一种杂志？既不能杂乱无章，又不要具有课艺性质，像一般学生所办的杂志那样。会议决定了所办的杂志应具有以下三种要素：

- 一、批评的精神，
- 二、科学的主义，
- 三、革新的文字。

刊物的名称，当时也进行了讨论。罗家伦提出“新潮”二字作为它的中文名称，徐彦之主张用 THE RENAISSANCE 作为它的英文译名，以比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大家同意，于是就决定下来了。此后，便拟订社章、决定组织。

二、新潮社的社章和组织

社还在草创时期，为适应当时需要，便于遵循起见，拟订的社章和组织很简单，还带点试验性质，约定在施行过程中，如感到有不够或不妥当之处，随时可加以变动。

在简章中，首先规定了社员的职责：每个社员都是撰述员，都负有供给杂志稿件的责任。次之，规定了入社的手续，无论本校同学或非本校同学，凡投稿三次，经本志登载的，都得由本社约为社员；不过非本校同学，还得由社员二人以上的介绍。

组织方面，分为编辑和干事两部，每部各设主任一人，由社员公举。编辑主任负配置杂志材料，审定稿件去取及处理有关编辑事务的责任。主任之下，置编辑及书记各一人，均由主任推定，请社员承认。编辑协助主任，与主任负连带责任。书记担任

编辑事务之记载，对外函件的往返及保管与编辑部有关的文件。干事主任总理编辑以外诸事务，如对外交际及杂志之出版发行等。主任之下，设置干事及书记各一人，均由主任推定，请社员承认。干事协助主任干事，与主任负连带责任；书记担任干事部事务之记载，对外函件的往返及其他与干事部相关的文件。

此外，还规定，本志每年发刊十期，每五期为一卷。于每卷终了的时候改选职员一次；但新职员未举出时，旧职员仍旧负责。

组织大纲决定以后，便于十一月十九日开第二次筹备会议，根据章程推定了第一任职员，他们是：

主任编辑傅斯年、编辑罗家伦、书记杨振声。

主任干事徐彦之、干事康白情、书记俞平伯。

职员推定，接着就着手预备稿件。当时因同学的踊跃参加，社员已达二十一人，^⑥故征集稿件，并非难事。但有几个虽属次要却非解决不可的问题，那就是社址和印刷发行等问题。这时候，李大钊正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馆址在北大第一院，当时称为“红楼”的第一层。他是热心赞助者之一，立即便腾出一间房子作为新潮社的社址。庶务主任李辛白也很肯帮助，把印刷、发行等事完全代为布置妥贴。发行由北大出版部负责，印刷由该部附设的印刷局负责。北大出版部成立于一九一七年，并在“红楼”的地下室附设了小型印刷局，排印北京大学讲义及刊物等；银钱出入由学校会计课负完全责任，社的干事概不经手银钱。万事俱备，《新潮》便顺利出版了。

三、《新潮》的读者对象及发刊主旨

《新潮》出版在五四运动以前，可以说是以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刊物。它在《新青年》的影响下

产生，同时又积极参加了《新青年》的反封建的斗争。在读者的印象方面，留下了《新潮》和《新青年》都以青年为对象；但也有些分工：《新青年》的读者偏重在大青年，高级知识分子；《新潮》的对象，主要是小青年，中学生。《新潮》发刊的主旨，第一是想把中等学生在封建主义顽固分子的毒害下拯救出来。在“发刊词”中它这样说：“本志同人皆今日学生，或两年前曾为学生者；对于今日一般同学，当然怀极厚之同情，挟无量之希望。观察情实，乃觉今日最危险者，莫过于青年学生。迨者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忧。然但能不传谬种，则此辈相将就木之日，即中国进于福利之年。无如若辈专意鼓簧，制造无量恶魔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长此不匮，真是殷忧。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第二是“尽力研究修学立身之方法与途径，喻之于众。”修学方面，本志于专论外，特辟“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商榷读书之谊；此两栏中，就书籍本身之价值批评者甚少，借以讨论读书之方法者甚多。”它站在革新派方面，竭力反对守旧派的“抱残守缺”。它并不完全否定国故，认为国故是应当研究的，但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去研究，而且比起现在世人所应当研究的科学来，真是“九牛一毛”。现在国人最要紧的事情，是“吸取欧洲现代确有价值的学术”来医治“我们学术思想上的痼疾”。立身方面，它主张从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与压迫下解放出来，恢复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它反对种种反映封建阶级没落思想出世的人生观，主张建立科学的入世的人生观，那就是“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的人生观”。“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代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之人格。”

四、“鼓吹”文学革命及其影响

在“文学革命”方面，《新潮》是《新青年》的积极响应者、鼓吹者。在《新潮》第一期出版的时候，白话文的刊物，还只出到五卷的《新青年》以及创刊才一月的《每周评论》，与《新潮》同时出世的《国民》月刊还是用文言的。傅斯年在他的《怎样做白话文》里，响应陈独秀的“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之说，进一步说：“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并说：“只有白话能做进取的事业，已死的文言是不中用的”。罗家伦在他的《什么是文学》中，更揭露“旧文学只是摆出道学先生的面孔，代圣人立言”的陈腐的东西，是远避人生的、说假话的、矫揉造作的。新文学应该是切合于人生的、求真的、自然的、发展个性的。

在白话文运动展开以后，反响很大。在北方，有古文家林纾^⑦写了一篇《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放了反对的第一炮。他对于新文学的攻击，纯然是出于卫道的热忱，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来说话的。经蔡元培的义正辞严、剖析事理的答辩，使他无话可以反驳。在南京，以胡先骕^⑧为首的东南大学一班复古的教授们，如梅光迪、吴宓之类，他们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引用了好些西洋的文艺理论做护身符。胡先骕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不仅大肆攻击白话文，并对陈独秀、胡适进行了人身攻击。罗家伦在《新潮》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了《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的改良论》，也是根据西洋文艺理论对胡先骕的基本论点逐一进行驳斥的。

白话文的运动，经《新青年》提出，《新潮》起而呼应，并与守旧派展开激烈的战斗以后，势力一天天的扩大和充实；它们的影响深入到内地，他们的主张一天天为无数的青年所信从。从

当时施存统^⑨给“新潮社”的信^⑩中，可以略见一斑。他在信中说：“敝校^⑪近来颇有改革的气象，同学关于新文学、新思想也极注意。大概看过《新青年》和《新潮》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感动；对于诸君极其信仰，学白话文的人也有三分之一。”

白话文的势力，不久扩展到日报里去，北京蓝公武^⑫主持的一个研究系的机关报——《国民公报》，首先起而响应；上海研究系的另一日报——《时事新报》，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也起来积极拥护。“有人估计，这一年中^⑬，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⑭可见白话文运动的势力是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着。”

《新潮》在宣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同时，还刊载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文学的作品。翻译方面，除了后一节要讲到的，周作人、沈性仁等翻译了西洋和日本的小说、戏剧外，还有潘家洵、赵承易等介绍了易卜生的名剧《群鬼》，萧伯纳的名剧《华伦夫人的职业》、《陋巷》，王尔德的名剧《扇误》，梅德林克的名剧《白丽爱 and 梅立桑》。这些剧本在当时大都在舞台表演过，受到青年的欢迎。孙伏园介绍了托尔斯泰的小说《高加索的囚人》、《伊凡的故事》等。新诗的创作是每期都有刊载的，康白情、俞平伯写得最多，后来都有专集出版；叶绍钧、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汪敬熙等也发表过作品。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创作小说的尝试。傅斯年在答复鲁迅的信中说：《新潮》里第一种成绩是小说，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在先，但由于它“其实是一个议论的刊物，对于创作并不怎样注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大抵是翻译”^⑮，发表创作小说的只有鲁迅一人，从一九一八年起，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此外没有别人发表过创作小说。《新潮》创刊以后，小说作者就多起来了，当时在《新潮》上发表小说的，

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等，“技巧虽幼稚，然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作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的目标”。^[16]鲁迅在给新潮社的信^[17]中说：“新潮里的《雪夜》、《这也是一个人》、《是爱情还有痛苦》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说家梦里也没有想到过。这样下去，创作很有希望。”当时上海正流行着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他们当然是梦想不到为人生的、改革社会的小说的。茅盾在谈到初期的小说创作时，也曾说：“一九一九年一月《新潮》杂志发刊以后，小说创作的尝试者渐渐多了……虽还没有说得上成功的作品，然而创作的空气渐渐浓厚了。”^[18]重视小说的创作，把小说作为改革社会的工具，并使创作的空气浓厚起来，可以说是新潮社同人在新文学建设方面的贡献。

五、《新青年》同人的支持

新潮社的创办，在经济方面得到《新青年》同人的支持，在供给稿件方面，也得到《新青年》同人的帮助。李大钊在《新潮》上发表了《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19]。他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论文《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也是在《新潮》上^[20]发表的。他还参加了北大学生林德扬的自杀问题讨论，写了一篇《青年厌世自杀问题》^[21]。鲁迅在《新潮》上发表了他的小说《明天》^[22]，还对《新潮》提了宝贵的意见。

关于鲁迅所提的意见，这里值得提一提。原来新潮社的社员，以文科学生占绝大多数，理科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新潮》所载多哲学及文学方面的文字。读者史志之来信^[23]，主张哲学、文学、科学“三者并论，于科学之实用者，尤当出以供人需要。”傅斯年的复

信接受了他的意见,认为:“《新潮》上没有纯正科学的东西,是我们第一憾事,以后当竭力补正。”鲁迅就是对这一点发表了意见。他说:“《新潮》每本里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字,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现在的老先生听人说‘地球椭圆’、‘元素七十七种’是不反对的了。《新潮》里充满了这些文章,他们或者暗地高兴。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25]

新青年同人供给《新潮》稿件的,除了鲁迅和李大钊外,还有王星拱,他在《新潮》上发表了有名的科学论文:《科学的真实是客观的不是?》^[25]《物和我》^[26];沈性仁翻译了苏俄高尔基的小说《私刑》和《一个病的城里》(?疑原文有误——辑注者)^[27],法国法郎斯的名剧《哑妻》^[28];周作人和胡适的诗;胡适作了自鸣得意的《李超传》^[29],还有一篇《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在《新潮》筹备时期,他曾被聘为顾问,新潮社的骨干如傅斯年、罗家伦等都出其门下;这也就是李大钊和鲁迅对新潮社虽然都曾怀过希望,提供过意见,而傅斯年等后来终于跟着胡适跑,“他们对待文学革命和‘国故’的态度基本上反映了胡适的思想”^[30]的原因吧。

六、《新潮》初期的发行情况

《新潮》的社员,前面已经讲过,只管编辑出版,发行是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主持的。北大出版部主要出售北大的出版物,如各科讲义及日刊、月刊等刊物,出售对象以本校学生为主,发行面是非常狭小的。《新潮》初刊时,代销处也只限于本校,北京市的一些高等学校及书报摊。外埠由于:一则不登广告,只靠同道的几个杂志互相介绍,知道的人不多;再则,《新潮》同《新

青年》一样，被一般守旧派视同洪水猛兽，一般书店就是知道也不敢代销；因此只有原来发行《新青年》的几家书店经销，如上海的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等。当时《新潮》的主要推销员倒是青年学生，他们自己看过杂志之后，借给同学看，寄给朋友看，送给兄弟姊妹看，如此一传十，十传百，由近及远，从北到南，作义务的宣传员、推销员，《新潮》的读者就这样越来越多，遍及到全国。许钦文在《五四时期的学生生活》^③中有几句话描写当时青年传播新读物的情况：“《新青年》《新潮》《北京晨报副刊》和后来上海出版的《学灯》^④《觉悟》^⑤，都为好学的青年所注意。报刊、书籍，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凡有新的好书，如果不寄给朋友看，好象是对不起朋友似的。友谊往往建筑在书籍的借阅、赠送和学术的讨论。”

《新潮》的读者既日多，为了供应读者的需要和要求，经销处也跟着多起来。但这时候，除少数的几个大城市外，由书店代销者仍极寥寥，还是由拥护新思潮、新文化，从而自愿推广新思潮、新文化的个人、学校、报社、图书馆、教育会、学校附设的贩卖部等经售代销的居多数，甚至有绸缎庄代销的，可见当时新文化的传播者，不是以谋利为目的的书贾，而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团体与个人。我们看一看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日《新潮》第二卷第一期封底所刊出的全国代卖处的名单，总计全国代销处不下四十余处，而由书店代卖的只占三分之一——十三四处！

七、新潮社初期所遭遇的困难

新潮社刊行《新潮》月刊，得到多方面的支持，进行是很顺利的，但也不是没有遭遇到困难。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出版第一卷第一期到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第五期的这几个月里所经过的困难，比较显著的，第一、是经济方面的波折。《新潮》的印刷费